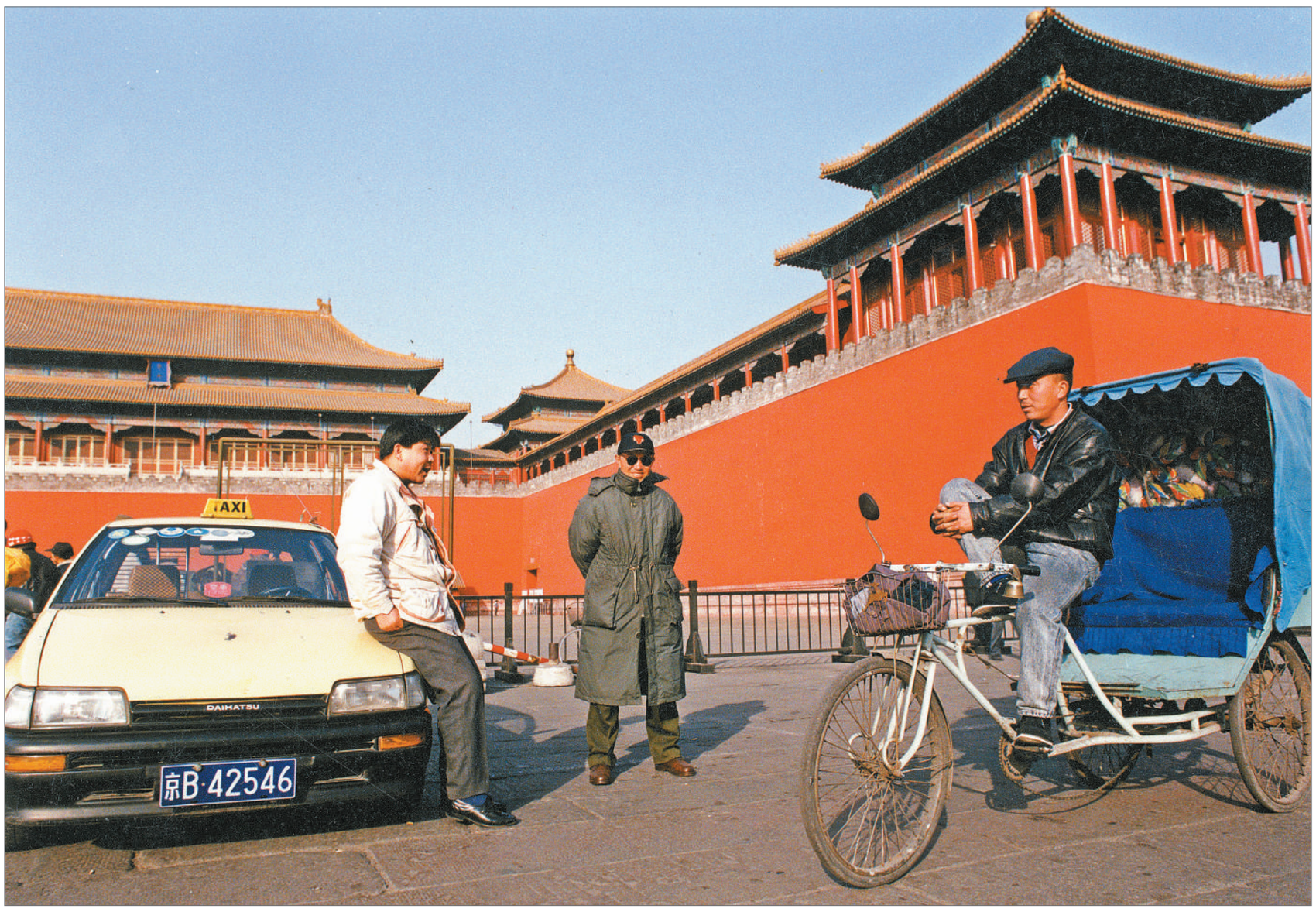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上世纪90年代，北京故宫午门外广场，等待客人的出租车司机和三轮车车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建泉/摄

如何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林

1988年7月15日，33岁的新华社记者李锦像往常一样剪贴报纸。他发现，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在他的印象中，这是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虽然这只是一篇学术探讨的文章，但他还是在“市场经济”这个词上画了好几道杠杠。

仅仅一年多后，另一篇基调完全相反的文章引起了更广泛的讨论。这篇题为《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的文章称：“如果我们……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

此时的中国，已经宣布改革开放近10年。从10年“文革”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推动着经济快速增长。但在内外部错综复杂的因素影响下，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再次交锋。

“物价闯关”搁浅

要市场还是计划？直接的缘起，就是1988年的“物价闯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多数物资和商品都有两个价格。同厂家同款型的商品，却有两个价格，唯一的区别在于是不是在计划内。在1985年前后，国家确定了计划内外钢材商品的销售比重是78∶22，煤炭是92∶8，石油是83∶17，食品类是59∶41，服装类59∶41……

为了管好计划内外的价格，国家费了很多功夫。1981年国务院新成立一个机构——价格中心，找来了50多位经济学家和价格专家，买了大型计算机，收集了全国的投入产出数据，编制投入产出表。

如此费心费力，但新旧体制共存的畸形发展依然难以为继。几年后，价格双轨制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在南京，1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炒卖了120多次，价格上涨近3倍。

在半管半放中，物价上涨的威胁加重了，猪肉、钢材、煤炭等食品和原材料的价格都开始上涨。很多国有企业都出现了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为此，政府一方面被迫增发货币，一方面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来限制价格，造成的结果是超发的货币不能由物价上涨冲销，酿成“隐蔽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体系进一步扭曲。

价格双轨制的局面必须改变！1988年8月19日清晨，一则消息通过广播传遍大江南北：中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该《方案》提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计划用5年时间让物价“闯关”。

出乎意料的是，“闯关”的物价很快就如脱缰的野马，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抢购潮。几乎所有的商店前都挤满了来抢购的人。有的人一口气抢购了一两百公斤的食盐，几百盒火柴。从当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价格以70%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很快跟进涨价。当时全国200多家电商工厂因为产销供大于求，积压严重，但是在抢购风潮中，仓库里的电扇都被一抢而空。

这场因“闯关”而爆发的物价暴涨和抢购，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8月27日，中央紧急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

事后，国家物价局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383种商品中，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而在这之前的3年，物价已累计上涨23.7%。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当时亲身经历了决策过程，也是贸然“物价闯关”的反对者。晚年在口述史中，他说一开始的“闯关”方案太过鲁莽，因为是在通货膨胀政策下放开价格。

1988年“物价闯关”搁浅后，宏观经济陷入紧张。许多企业工厂倒闭，失业人员增加，消费缺乏活力。1989年，中国经济增速降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

一锤定音

宏观经济的遇冷，让当时尚处于生长期的民营企业感到切身寒意。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工商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了一半多。

船至中流，突遇漩涡，航向何方？

1990年7月，中央召集10多位经济学家出席了一场经济问题座谈会，“市场派”与“计划派”再次当面交战。当时，吴敬琏是“市场派的旗手”。这次会议过后，传出了“有计划、吴市场”的说法，批评吴敬琏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在复杂的形势和喧嚣的争论声中，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为市场经济的前路一锤定音。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巡讲话”。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南巡讲话”使改革回到了正确的航向。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认真总结了过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得失，并且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表述修正为“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规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成为上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经济的春天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1992年一整年都是“经济的春天”。

在北京，从当年2月开始，新增公司的数量以每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中关村的科技企业数量，在1992年年底已冲到了5180家，是上一年的2倍。沃尔玛、麦德龙、宜家等国际零售巨头也在这一年纷纷入场，想在中国市场分一杯羹。

经济社会的发展热气腾腾，一批青年改革者、创业者脱颖而出。

从1990年到1993年，周小川和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人，在吴敬琏的带领下，组成“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提出了近中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方案，对国有经济、财政、金融、外汇管理、社会保障、政府职能等方面也提出了改革设想。“配套改革，整体推进”的主张影响至今。

199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30多岁的研究人员陈东升辞职，创办了嘉德拍卖公司。当时的国内，拍卖行业还是一片空白。后来，陈东升说，这一年国家体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他觉得这两个条例“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几年后，他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

陈东升在北京辞去公职的这一年，南京上演了一场国营大商场与民营小市场的激烈“商战”，年仅30岁的张近东一战成名。

当时，张近东创办的苏宁公司已小有名气，但当时占据在南京城里家电零售市场大头的，还是国营的八大商场。张近东的苏宁公司，不仅在价格上与之针锋相对，还拉起了一支300多人的专业服务队伍，提供上门安装维修服务，最终凭借“规模经营、厂商合作、专业化服务”等优势一战取胜。第二年，苏宁的空调销售额达到惊人的5.6亿元。

开辟住房新时代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丽梅

穿越回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可能会看到这样一番景象：一家三代共计8口人“蜗居”在9平方米的小屋里，入夜，地上便躺满了人；第二天早上醒来，居民们一边手提着马桶，一边跟邻居打招呼，穿越大大小小的弄堂奔向化粪池。有时赶巧，与邻居在“一线天”弄堂“狭路相逢”，两个人还要来个亲密接触：背靠背贴墙而过。

1994年，为了解决老百姓“住房难”的问题，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正式启幕。这场改革的初衷不仅是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更重要的是让“居者有其屋”。

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赵秀池表示，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是对我国住房福利制的革命，从福利变成商品，与住房相关的各个领域都被重塑，也进一步将人们从计划经济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不断迈向市场经济。

同时，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发展壮大的房地产行业也成了当时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火车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有房可买：一个新住房时代的开启

改革之前，很多人住房问题的解决路径一般是“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那时，我国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

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是，随着房源越来越紧张，分房排队成了一种常态。有的人一等就是很多年，等来的房子也是“老、破、小”；也有人一辈子没有分到房。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缺房户达869万，占城市总户数的47.5%。

1980年，中国开始迈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步伐。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建筑业的地位和住宅政策问题的谈话，对住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在内的全过程进行了通盘的改革设计，其中包括出售公房、调整租金、提倡个人建房买房等内容。

一段时间内，住房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明显缓解。退休的上海某国企员工吴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起30多年前的分房场景，“当时，我们家双职工，等了6年，人均2平方米以下，1988年分到一个单身宿舍，当时儿子都3岁了。”

为了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正式改革之路。文件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并加快住房建设，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

不久，住房领域又迎来了更硬核、更彻底的改革手段。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文件提出全国城镇从1998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宣告了福利分房时代的结束。

“可以把1998年看做是我国房地产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赵秀池表示，此前，住房主要由国家拨款投资建设，只收取微薄的房租，每年甚至连维修费都不够，房子越建越多，国家和企业负担越来越重，住房建设的模式不可持续。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一些住房改革制度的探索之所以收效不明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租售价格比不合理。 （下转6版）

2007年10月7日，一列城铁列车经过北京天通苑居民区附近。据介绍，近20年来，经过住房改革制度的改革，老百姓无论是居住面积还是居住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企业家走进黄金时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晨赫

如果没有多坚持一年，“饲料大王”刘永好的创业路可能止步于1991年。

那一年，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讨论正火热。有人说，刘永好四兄弟经营的公司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他灰了心，想把公司交给国家。县委书记说，还没接到通知，你们先悄悄地干。

这一干，他们等来了新时代。

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了系列确立中国发展道路的讲话。

武汉，“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长沙，“搞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要加快经济发展”。广东，“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离开深圳时，邓小平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在珠海，他说，没有从1984年到1988年取得的进步，1989年到1992年这个困难时期的事情就不会这么顺利。

事实上，1984年到1988年取得的进步，绝非一帆风顺。

在“摸着石头过河”向前的探索中，难免试错，政策也会出现摇摆，民营企业家的心也始终悬着。霍英东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经历反映了当时许多企业家的心态。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写道，霍英东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

联想、万科、海尔……都诞生于1984年，经营者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赋予“84”派企业家的称号。1988年，第一批“全国优秀企业家”被公布，20人中，有12人是厂长，4人是经理。企业家们面临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赚了这么多钱，算谁的、怎么分？

同时，随着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商品积压、工厂停产、工人下岗。改革的风向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1989年，一些个体工商户申请停业或自行协议，人们不愿意去私营企业上班。山东临沂市沈泉庄某企业的厂长王廷江将总价值600万元的资产无偿捐给村集体；江苏宜兴一家电缆厂厂长蒋锡培也将工厂捐给集体，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名号得以继续经营。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当时还在做冰箱厂厂长，也把工厂捐给了乡政府，自己全身而退。

刘永好也是想“捐工厂”的企业家中的一个。但最终，他们等到了“春天”。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议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方向明确了，发展才能稳。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可以让后来的人们感受到当时经济腾飞的痕迹。

（下转6版）

责任编辑 / 潘圆 版面编辑 / 张蕾 图片编辑 / 陈剑 美术编辑 / 张玉佳